

Week Topic: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Politics: Ch12 Foreign Relations

Presenter: 楊中天

ID: M016070001

Date: 2013/5/28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Politics CH. 12 Foreign Relations

第一節 前言

日本對外關係的內在形成要素主要由孤立感及依賴感所構成。孤立感首先來自於日本的地理條件：島國，由於日本四面環海使其文化、政治的發展較少受到其他國家的直接影響。而由地理上的隔絕衍伸而來的心理上的孤立感是影響日本國家發展及對外政策形成的核心因素。此種心理上的孤立感源自於日本的地理特性，且在鎖國政策結束後得到加強。

在 1854 年幕府結束鎖國政策及 1868 年明治維新開始之後，日本開始了現代化運動，加深了她與世界的連結。近代的日本儘管地理上與其他國家隔絕，但其社會、文化、政治的發展卻不斷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這使得日本人心理上的孤立感更加深刻。此外，由於日本缺少工業化所需的天然資源，使其依賴國外原物料的進口和工業技術的引進。這種地理上與世界隔絕，現代化過程中卻又亟需依賴外來的資源、技術、文化的現實條件，使得日本人心中普遍產生一種不安全感及貧乏感，需要藉由心理上的補償來得到滿足。

自幕府開國以來，孤立感和依賴感造成了日本強烈的國家意識。此種國家意識有助於日本在一個備受外在環境制約的情況下，產生一種強烈的動機去突破外在環境的限制，並建立其在世界的主導性。而二戰的結束代表著透過軍事手段來實現此一目標的失敗。

直到 1952 年美軍佔領結束後，日本在國際政治的領域已經失去其二戰前東亞霸權的地位，無法與戰後的世界強權相提並論，而在經濟上日本依然未擺脫對外在世界的依賴，正是這種源自幕府末期並持續到二戰結束都還未擺脫的脆弱心理促使日本在獨立後，企圖以創新的對外政策來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

第二節 韓戰與舊金山和約

一、對美關係

1950 年韓戰爆發，為日本帶來了經濟上快速成長的契機。由於日本是美國控制下距離南北韓戰場最近的地區，故戰爭一開始，日本就成為美軍的後勤供應基地。大量軍需訂單湧向日本，形成了所謂「特需景氣」。因為韓戰而帶來的特需景氣除了使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以外，也在經濟上加深日本對美國的依賴。

韓戰爆發後，由於擔心日本本土防衛力量的真空，美國遂加緊對日簽署「和平條約」及「安保條約」的速度，同時著手重新武裝日本。1951 年

日本政府根據麥克阿瑟的指令，建立警察預備隊，邁出了戰後重建武裝力量的第一步。

1951年9月8日，就在《舊金山和約》簽訂五小時後，日美兩國又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美日安全條約》與日後簽署的《美日行政協定》確立了美國駐軍日本一事。

1950年代初期，是日本於二戰結束後首次重返國際舞台的關鍵時刻。藉由韓戰所帶來的“特需景氣”日本經濟有了快速累積資本與發展先進技術的機會，《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使日本正式結束與27個國家的戰爭狀態，並結束了長達7年的美軍佔領時期，獲得了法律上的獨立。而《美日安全條約》的締結進一步確立了日本的安全將持續依賴美國提供軍事保護，並且也為日後日本的重經濟、輕軍事的吉田主義發展策略做了最好的鋪陳。可以說，韓戰的爆發給了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一個大好機會，而《舊金山和約》、《美日安全條約》的簽訂決定了日本會以何種姿態重返國際。

二、對蘇關係

1953年史達林逝世與韓戰《停戰協定》的簽訂，使得日蘇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契機。韓戰結束後，日本亟需加入聯合國，藉以重返國際社會，因此發展對蘇的友好關係，成了日本此時期的一大外交重點。但是自從二戰結束以來，以下問題依然阻礙著日蘇關係的正常化：

1. 北方領土爭議：

- (1). 日本主張國後、擇捉、齒舞、色丹寺島為日本固有領土，並不包含在《舊金山和約》所提及的千島群島內，且蘇聯或俄羅斯帝國從未擁有其主權。
- (2). 蘇聯主張北方四島根據《雅爾達密約》及《舊金山和約》日本已放棄其主權，並歸入蘇聯的領土。

2. 戰俘遣返問題：日本主張蘇聯應以人道主義為原則，盡速遣返。

蘇聯則主張雙方應先恢復邦交，始能遣返。

3. 美方態度：不願見到日蘇關係復交速度過快。且表明若日本承認蘇聯擁有國後、擇捉兩島，則美國將永遠佔領沖繩。

以上源自於戰前《雅爾達密約》與戰後的《舊金山和約》所遺留下的領土爭議，成為日蘇之間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阻礙。

三、對中關係

1952年起，日本的對中政策受到冷戰格局的限制與美國的牽引，只被允許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交，因此兩國於1952年簽定和平條約，結束戰爭關係。

雖然此時日本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尚未建立，但是日本政府極力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此被稱為「政經分離的外交原則」也被日本的私人企業接受，並順勢擴大企業在中國大陸的利益。

第三節 吉田主義與《日蘇聯合宣言》

一、 對美關係

1954年日美簽署了《美日共同防禦援助條約》，根據此條約美國有義務提供日本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而日本則必須重新武裝以配合美國的亞太政策。作為上述協定的補充，日美之間還同時簽署了《購買農產品協定》、《經濟措施協定》、《保障投資協定》等。根據上述協定，美國要求日本用日元購買美國的剩餘農產品，即剩餘小麥，再以銷售小麥獲得的日元作為資金來發展軍事工業。因此實際上，日本只是承擔了防衛義務，並沒有從上述協定中得到渴求的純經濟援助。相反，購買和銷售美國剩餘農產品反而衝擊了日本的農業，並使日本在外交上進一步依附於美國。

自 1951 年日本獨立後，日本的外交路線即以美國為中心，此時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都是配合美國遠東政策的產物。從《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到與美國之間的《美日安全條約》、《美日行政協定》、《美日共同防禦援助條約》等，可以看出日本的吉田政府在獨立初期選擇了在經濟及軍事上倚賴美國的援助，但是這種有損日本主權的外交路線卻也成為了日後吉田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但是無論如何，吉田為日本確立的“重經濟、輕軍備”，依靠美國保衛日本的安全，自己全力發展經濟的外交準則，卻為日本以後的歷屆首相所繼承。

二、 對蘇關係

1952 年鳩山一郎擔任首相後，對於吉田茂的外交路線加以修正，並著手進行日蘇關係正常化的工作，雖然日蘇兩國對於領土爭議還未達成共識，但雙方還是於 1956 年簽訂《日蘇聯合宣言》。

《日蘇聯合宣言》的大致內容如下：

1. 結束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重新建立兩國之間的和平善鄰友好關係。
2. 恢復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互派大使級的外交使節。
3. 蘇聯支持日本提出的關於加入聯合國的申請
4. 《宣言》生效的同時，蘇聯釋放並遣返仍被拘留在蘇聯境內的全部日本戰俘，並應日本的要求繼續調查失蹤的被俘人員。
5. 兩國同意在外交關係正常化以後，繼續談判簽訂正式和約問題。蘇聯同意將齒舞群島和色丹島移交給日本，但移交只能在締結日蘇和約以後進行。

《日蘇聯合宣言》的簽訂是二戰後至今兩國關係最重要的進展。日蘇恢復邦交成為了鳩山內閣的最大外交成就，尤其是在美國及國內親美派的壓力下，鳩山一郎在繼續維護日美結盟關係的範圍內，對吉田路線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並領導日本自主外交的方向邁進。

三、 對中關係

二戰結束後至 1954 年，由於吉田政府採取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使得日中(PRC)之間的外交關係受限，日本與台灣(ROC)維持邦交，對中國(PRC)實施禁運，日中(PRC)關係發展緩慢。

到了 1953 年因著史達林的過世，以及同年韓戰的結束，再加上 1954 年法越戰爭的結束，中國總理周恩來於 1954 年提出了對日本的「漸進式外交」，意指先藉由發展漸進式的，廣泛的經濟及文化上的對日關係，作為二戰後中日關係恢復的第一步。在此時期正值日本首相鳩山一郎主政，其對於吉田外交路線的修正，重視與蘇聯及亞洲鄰國的外交關係，使得日中之間有了更多的往來。此時日中的往來主要集中在官員的互訪、學術、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並且達成了許多私部門貿易往來的協定。

總的來說，鳩山主政期間的日中關係較吉田時期更為積極，但還是停留在民間外交的部分，正式的外交關係還未有進展。

第四節 岸信介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條約》

一、對美關係

自從岸信介於 1957 年擔任日本首相以來，日本的經濟呈現高度成長，對於資源和市場的需求也持續擴大，此時即產生了修正吉田主義的呼聲，因此岸信介主張要在外交領域上恢復日本的自主性，擺脫政治上受制於美國的現狀，再加上駐日美軍傷害日本國民的事件接連發生，使得國內反美情緒增加，而岸信介此時即利用此一民氣向美國施壓，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條約》。

1960 年 1 月 19 日，日美兩國在華盛頓簽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條約》即俗稱的《新安保》，與 1951 年簽訂的《日美安全條約》即《舊安保》最大的不同在於增加了日美兩國的對等性，舉凡條約內容中刪除了美軍擁有鎮壓日本國內動亂的「內亂條款」，以及駐日美軍無論是在日本本土內、外的軍事行動日本都可參與協商等變動。然而，《新安保》的簽訂引起了周邊國家的反對，諸如蘇聯、中國(PRC)及東南亞國家均對《新安保》的簽訂產生疑慮，而就在此國際氛圍下，日本國內也出現了極大的反《新安保》的聲浪，反對派認為《新安保》將把日本重新帶回戰爭的邊緣，因此發起了示威遊行，後演變為「安保鬥爭」，而岸信介政府就在「安保鬥爭」的浪潮中結束執政。

二、對蘇關係

雖然日蘇關係至鳩山一郎執政期間獲得長足的進展，但是由於兩國之間的北方領土的爭議及冷戰的格局，使得雙邊關係難有進展。而在岸信介主政後，由於日美之間《新安保》的簽訂，導致日蘇關係進一步的停滯。蘇聯對於日美軍事同盟透過《新安保》的延續，感到不安和反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甚至表明，《日美安保》若繼續，則日蘇之間的關於領土問題、漁業問題的談判都將不會有任何進展，並強調日美軍事同盟的延續將加強蘇聯控制北方四島的強度。日蘇之間的關係再度陷入停滯。

三、對中關係

1957 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其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中提到，將持續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ROC)，並強調其對抗共產勢力的決心。對於 1958 年日中(PRC)企業、貿易團體簽訂的第四次《日中貿易協定》，岸信介特別強調(1)

不承認中國駐日的商務機構具有外交上的特殊地位，並禁止中國國旗懸掛於日本境內，此番言論及後來發生的「長崎國旗事件」引起中國政府(PRC)的不滿，並宣布終止日中兩國之間的經濟及文化交流。

第五節 池田勇人的經濟外交

一、 對美關係

岸信介內閣在聲勢浩大的“安保鬥爭”中垮臺以後，1960年7月18日，池田勇人內閣成立。池田主張大力發展經濟，走經濟大國之路；反對大規模擴充軍備，主張依靠日美安全條約來保障日本的安全。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設法穩定動盪的政局。此外，國外對日本日益高漲的關注和對日本經濟成就的肯定，為日本國民帶來極大的鼓舞。日本人開始掃除戰後以來的自卑感，逐漸增強了自信心。

與岸信介相比，池田強調內政與外交的一體化，因而其外交帶有濃厚的經濟色彩。如果說岸信介追求的日美關係是一主要表現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對等關係的話，那麼池田內閣謀求建立的日美“平等夥伴關係”，則更加著重於經濟方面。而甘迺迪政府為亞非拉地區的局勢及美元危機所困擾，需要日本的合作，以協助美國的遠東戰略，保證低關稅和自由貿易。

二、 對蘇關係

1960年池田勇人上台後，為搭配其經濟大國的發展路線，故大力推展與蘇聯之間的經貿往來。而蘇聯因為國內經濟的衰弱，再加上與中國之交惡，使得蘇聯也願意與日本發展良好的經貿關係，以達到開發西伯利亞、牽制中國的戰略目標。雙方於1961年簽訂《日蘇通商議定書》，除加強雙邊貿易總額外，也在戰略上具有牽制中國(PRC)的效果，因為此時的中國正同時與蘇聯和日本交惡。

三、 對中關係

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位時，當中國的大躍進政策確定失敗，中國的經濟結構遭受嚴重破壞並與蘇聯關係惡化之際，日中之間遂開始建立新的貿易關係，1962年日中簽訂新的雙邊貿易架構協定——《日中長期貿易備忘錄》。池田政府秉持著以對美關係為主軸的外交路線，發展與中、蘇兩國的經貿合作來實現其經濟外交的政策目標。

第六節 佐藤榮作與沖繩的歸還

一、 對美關係

1969年7月，尼克森在關島提出「關島原則」，後被推廣為美國全球政策的基本原則，即所謂「尼克森主義」。鑒於美國在越戰所得到的教訓，尼克森主義中的亞洲戰略應以亞洲國家為主體，因此，日本就成為美國建立亞洲戰略時必須合作的對象之一。

為了讓日本在亞洲進一步分擔責任，在經濟和防衛上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尼克森決定儘快解決沖繩問題。佐藤與尼克森於1969年發表《日美聯合聲

明》。該聲明提及：

1. 美國將於 1972 年將沖繩行政權歸還日本。
2. 《日美安全條約》的有關規定也全部適用於沖繩。
3. 美國將保持在沖繩的軍事基地。
4. 在沖繩歸還後，日本將逐步擔負起該地區的防禦責任。
5. 維護韓國和臺灣的安全也就是維護日本的安全，因此如果朝鮮半島和臺灣地區遭到武裝進攻，日本也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

二、對蘇關係

佐藤榮作主政期間是二戰後日蘇關係最友好的時期。佐藤榮作於 1964 年執政後，繼承池田的經濟大國方針，並將歸還沖繩及小笠原諸島視為外交工作的重心，而此時的對蘇政策正是在此指導原則下進行的。首先在歸還沖繩的議題上，日本除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外，也加強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企圖孤立越戰中與美國敵對的中國，藉以達到歸還沖繩的目標。這段時間內日蘇之間政府官員密切互訪之外，還簽訂了許多雙邊協定，例如：《日蘇航空協定》、《日蘇長期貿易支付協定》以及《日蘇領事條約》確定定期舉行外長協商會議。此外，經濟的互補性也成為了日蘇之間經貿交流的一大誘因，諸如《遠東森林資源開發計畫》等關於日蘇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協定也陸續達成。

三、對中關係

佐藤榮作主政期間，遭逢美中關係因越戰而交惡，並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使得日本採取強硬的對中政策。佐藤繼承吉田主義的對外政策，以日美同盟為外交主軸，並以要求美國歸還小笠原、沖繩群島的管轄權為目標，遂採取了一系列鞏固中華民國(ROC)在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並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加入聯合國。

第七節 田中角榮到福田起夫的「全方位外交」

一、對美關係

從田中角榮到福田起夫的 70 年代日本對外關係可以統稱為邁向「全方位外交」的過程。促使日本從過去「一邊倒」依賴美國的外交路線轉向「全方位外交」的原因有以下三點：(1) 日本經濟實力上升，與美形成「平等夥伴關係」(2) 美中於 1972 年簽訂「上海公報」，日美關係出現隔閡(3) 越戰結束，美軍需要日本分擔維持亞洲秩序的責任。1970 年代中期隨著越戰的結束，共產勢力不斷南下，而美國在退出越南之後認為亞洲亟需一種力量來填補國際力量的真空，因此要求其亞洲主要盟國日本承擔起這一責任。此時福田內閣確定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路線，在不脫離對美外交的前提下，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一方面努力協調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進一步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增加政府開發援助和其他經濟援助，透過“經濟外交”增強日本的影響力，為提高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創造條件。

福田執政期間，在重視協調與其他已開發國家關係的同時，從自身利益出發，並配合美國亞洲戰略的變化，開始高度重視發展亞洲的外交布局，特別是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和中國的關係。1972 年的中日建交及 1979 年的《中日和約》的簽訂都是在「全方位外交」路線下達成的具體成果。

二、對蘇關係

1. 田中角榮時期：蘇聯於日中建交後，積極拉攏日本，不惜藉由承認北方四島的爭議來換取與日本對話的空間。
2. 三木武夫時期：蘇聯對於《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中提及的「反對亞洲任何霸權形式的形成」表達強烈抗議，認為此舉有損蘇聯在亞洲的利益，並禁止日本人民進入北方四島掃墓。
3. 福田起夫時期：1976 年蘇聯已在北方四島周邊海域劃定專屬漁場管制區，日蘇關係緊張，但透過簽訂《日蘇漁業臨時協定》獲得緩解。

1978 年蘇聯欲與日本簽訂《日蘇睦鄰合作條約》，但因其恢復「不存在北方領土爭議」的論調，日蘇之間自二戰結束後未簽訂任何形式的和平條約。1979 年蘇聯出兵阿富汗，日本參與聯合國對蘇制裁，雙方關係再度進入冰凍期。

三、對中關係

1971 年中國(PRC)加入聯合國，並取代台灣(ROC)在安理會的席位，美國總統尼克森並於 1972 年訪問中國，與中國政府簽訂上海公報，此舉徹底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

1972 年田中角榮當選日本首相，主張建立與中國(PRC)的邦交。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簽訂「中日聯合公報」，

田中內閣將佐藤內閣時期對中蘇外交過於偏重日蘇關係的傾向予以糾正，在主張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是發展日蘇關係的前提時，也強調在任內對外交涉的最大課題是實現日本與中國的邦交正常化。日本外交開始向日中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方向前進。

第八節 大平正芳到竹下登的「大國外交」

一、對美關係

1978 年大平正芳就任首相後，國際局勢出現了三大變化：

1. 美國自 70 年代初因越戰失敗帶來的政經影響力的消退還未停歇。
2. 蘇聯軍備的擴張，與入侵阿富汗。
3. 伊朗革命與兩伊戰爭導致石油危機。

以上變化使得日本自覺必須與美國建立起全方位的保障協定。而此時美國也希望與日本共同分擔維護亞洲安全的責任，因此日美雙方於 1978 年簽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強化美日聯合軍演的強度與頻率。大平正芳也於 1979 年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極其三根支柱：

1. 建立有限度高質量的防衛力量與切實運用美日安保條約。
2. 以有秩序及活力的民主政治來發展日本內政。

3. 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力。

「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極其三根支柱標誌著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被動的倚靠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而開始以包括軍事、經濟、文化、科學等全面的對外政策來積極面對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的挑戰。

自 1980 年代起，隨著日美之間的貿易逐漸向日方傾斜及日美之間的安保關係趨向對等，日美關係逐漸邁向新的階段，就在日本經濟實力大幅上升的同時，政治影響力的擴張也逐漸展開。

在 1982-1989 年中曾根康弘與竹下登執政期間，日本的國力獲得了更大幅度的成長，但是隨著經濟實力、軍事研發實力的提升，更凸顯了日本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不足；經濟大國、外交小國的窘境更顯突出。此時日本尋求政治上更大的國際影響力的企圖更加積極。除了強調日本與美國擁有平等的承擔世界義務的責任外，也積極活躍於 G7 峰會上，試圖透過分擔國際事務責任來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並且中曾根康弘與竹下登兩位日本前首相，屢次在 G7 峰會上表明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有責任也有能力參與更多國際事務與承擔更多責任。

二、對蘇關係

1980 年代中曾根康弘與竹下登執政期間，日蘇關係可說是維持經濟熱、政治冷的局面。自 1980 年代開始，日漸鬆動的冷戰格局為日蘇關係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條件。此時的蘇聯領導人除了開始著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外，改善對日關係也是一大重點。有鑑於蘇聯受到長年軍備競賽的拖累，國內經濟日漸衰弱，而其亞洲鄰國日本卻有大量的資金和關鍵技術有助蘇聯擺脫困境，日蘇雙方遂有誘因改善關係。自 1986 年起日蘇雙邊貿易大幅增加，日本在電器、石化、水產等領域都增加對蘇的投資。雖然經貿往來增加，國際局勢也有利於日蘇關係的緩和，但是在政治上的議題，例如簽訂《日蘇和平條約》的談判，卻因為北方領土的問題而始終沒有進展。

三、對中關係

自 1972 年日中建交以來，日中雙邊關係漸趨和緩。到了 1980 年代，日中之間國家元首及政府官員互訪成為了這時期兩國關係友好的標誌。1983 年中國總書記胡耀邦訪日，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達成《中日友好四原則》：「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象徵著兩國關係的穩定友好關係，並且也表明日中雙方經貿上的互利合作重點。隔年日相中曾根康弘訪中，並帶給中國基礎建設 4700 億日圓的貸款。1987 年竹下登就任首相，在對中政策上繼承中曾根康弘的路線，並與中國簽訂《日中投資保障協定》，為此時期有好的中日關係下了一個明確的註解。

第九節 宮澤喜一與後冷戰初期的外交政策

一、對美關係

1991 年宮澤喜一出任首相之際，也是冷戰體系結束的時候。面對冷戰結束的新國際局勢，日美之間依然維持著由美國領導，日本配合的基本型態，

只是在面對世界邁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時，日本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下降的趨勢，且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有增無解，導致此時期的日本在對美關係上企圖尋求更大的自主性。此時的日美關係可以“政治合作、經濟競爭”來形容。

在政治合作方面，1992 年美國總統布希與日相宮澤喜一發表「東京宣言」，宣言中提到，確保日美安保體制繼續運作，並且將安保範圍做全球性的擴張，以及日本願意負擔更高的駐日美軍費用。「東京宣言」確保了日美關係在後冷戰時期依然以日美安保為發展主軸。在經濟競爭方面，長期巨額對日貿易逆差和日本資本的大量湧入，美國國會、企業界和一般人民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和日益強烈的不滿，「日本威脅論」開始在美國盛行。

而此時，在日本也出現了一股強硬的思潮，並且在一般國民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代表就是SONY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和國會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此書鼓勵日本人拋棄二次大戰後形成的「小國意識」和屈從美國的意識，走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日本可以說不」的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界「鷹派」人物的觀點，也是日本「大國意識」的自然流露。

二、對蘇關係

1991年宮澤喜一就任日本首相，立即面臨到蘇聯解體的巨變，並把日俄關係視為其對外關係的一大突破點。宮澤喜一認為蘇聯剛解體，國內政治不穩，經濟改革也急需日本的資金，因此此時為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最佳時機。但由於俄羅斯國內政局不穩及宮澤堅持不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就沒有經濟援助的原則，兩國並沒有達成具體的進展。宮澤的繼任者細川護熙也秉持著北方領土優於一切經貿談判的原則處理日俄關係，故日俄關係在90年代初期也難有進展。

三、對中關係

宮澤喜一上台後，適逢蘇聯解體，兩極對抗的局面結束，開始以推展與亞太國家的多邊關係為重點，日中關係也包含在內。此時期日中關係持續暖化，1992 年日本天皇明仁與皇后美智子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之邀訪華，象徵著日中關係在後冷戰時代的良好開始。自 1992 年起，日中之間的貿易量持續上升，到了 1996 年時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也成為日本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第十節 美日安保—冷戰後至今的演變

冷戰結束及波灣戰爭的爆發，使得美國希望日本加強在「美日安保」中的集體防衛力量，開啟了冷戰後日美關係的新頁。但是日本在第一次波灣戰爭裡還是選擇只做一個「支票簿強權」(checkbook power)，只願意提供 150 億美元的戰爭援助資金。雖然如此，90 年代後的美日同盟還是朝向更廣、更深的合作。造成美日同盟更緊密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為因應冷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及反恐戰爭的需要，美國希望日本能成

為更積極的盟友，並期望美日同盟能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有更多的發揮。

二、日本國內右派政治人物主張日本在面對新時代的威脅諸如恐怖主義、北韓的威脅及中國的崛起時應該成為「正常國家」予以應對。

正是以上這兩種內、外在的因素，導致後冷戰時代的美日關係持續以「美日安保」為基礎，並擴大兩國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1994 年的北韓危機促使日本開始重新思考「美日安保」之下日本自衛隊的角色以及重新定義日本的潛在威脅。1996 年柯林頓與橋本龍太郎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並為了因應北韓的威脅，美日還於 1997 年確立「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強調美日在安全、軍事領域上的合作，其中還提到若日本周邊地區出現威脅時，美日可採取聯合軍事行動。1999 年日本通過「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即是為了實現「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所提到美日聯合軍事行動，而制定的國內法，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扮演更及角色提供法律依據。

1997 年的北韓危機與台海危機刺激日本加強與美國的合作，並促使日本的安全政策轉向積極維護區域安全的方向。到了此一階段，隨著日本的防衛原則從過去的「專守防衛」逐漸變為維護區域安全的角色，美日同盟及美日合作擴大至全球層次。

2001 年爆發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促使美日關係邁向更深、更廣的軍事同盟。同年日本國會通過的「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案」即為了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而賦予了自衛隊更大的活動空間。而 2003 年日本更針對美國的反恐戰爭，通過「有事三法案」，旨在確立日本遭受攻擊的回應機制以及回復美國「阿米塔吉報告」中對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與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要求。至此，美日之間的合作已從傳統上美國負責防衛日本及日本只負責「專守防衛」的思維轉為日本是維持亞太地區安全的穩定力量，美日同盟的範圍從日本轉向周邊地區。此外 2005 年發表「美日安全保障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其中提到美日在全球共有 18 項「共同戰略目標」，及 2007 年美日發表聯合聲明，提到將與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澳大利亞、印度與北約加強合作。此兩大聲明都是美日同盟的擴大與加深的具體展現。

但是到了 2009 年民主黨執政時期，日美同盟的發展開始出現停滯現象。鳩山由紀夫與小澤一郎對於普天間基地遷移一事與美國發生爭執，此外鳩山也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概念」，企圖建立「日本—美國—中國」三角等距離關係。到了野田佳彥執政時，日美雙方關於日本是否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存在分歧，再加上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還未解決，日美關係未獲得緩解。總結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日美關係，主要是由於民主黨在重大外交議題上對內未能有效溝通，對外無法掌握分寸，導致此階段日美關係發展遲緩。

2012 年 9 月自民黨重新執政，首相安倍晉三企圖修復民主黨執政時期發

展停滯的美日關係，他重申將以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外交的基礎，並加深美日之間的合作，一般認為安倍此舉是為因應中國的軍事擴張及日中之間釣魚台的爭議，而採取的加強美日同盟的舉動。

第十一節 日俄關係—北方領土上的角力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繼承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地位，而俄羅斯聯邦也繼承前蘇聯的國際地位及大部分的國際條約，其中也包含對日關係的所有文件。

蘇聯剛解體時，日俄雙方皆認為這是一個改善雙邊關係的契機，因為葉爾欽試圖進行民主及市場經濟的改革，需要穩定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並且需要日本的援助進行改革，雙方也透過外長向彼此表達願意朝向更穩定友好的關係前進。但是 1992 年葉爾欽突然取消訪日行程，導致雙方關係急遽惡化。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是日本在北方四島的強硬立場導致葉爾欽取消訪問行程，而日本國內認為葉爾欽此舉是極度無理及不尊重日本的行為，兩國國內輿論的激化導致雙邊關係陷入僵局。然而隨著俄羅斯經濟陷入通貨膨脹的困境，美國及歐洲國家為了使葉爾欽的改革得以延續，決定經援俄羅斯，而日本也被要求加入經援的行列。

1993 年日本政府決定援助俄羅斯 15 億美元並邀請葉爾欽訪日。在軍事鎮壓完國內反對勢力的暴動後，葉爾欽於 1993 年的十月訪日。葉爾欽訪日的具體成果為日俄《東京宣言》，其中包含日俄間的三大共識：

- 一、日蘇之間所簽訂的所有條約、協定都由俄羅斯繼承。
- 二、日俄之間的領土爭議將根據兩國之間所達成的協議、歷史及合法的事實、法律和正義的原則為基準加以解決。
- 三、解決北方四島的爭議是日俄簽訂和平宣言的前提。

雖然 1993 年的日俄《東京宣言》與 1956 年的《日蘇聯合宣言》在解決領土爭議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在蘇聯解體後的新國際體系裡還是有其價值，日本也樂觀其成。

1993 年到 1996 年日俄關係的發展陷入停滯，主要是因為俄羅斯國內政局的不穩及經濟上面臨通膨的壓力，此外自 1994 年起車臣的武裝衝突也使得莫斯科當局無暇顧及與日本的關係。

1996 年橋本龍太郎擔任首相後，開始著手讓日本在新的國際體系裡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極為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橋本在 1997 年發表日本新歐亞政策時提到，將秉持互信、互利和長遠的角度來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橋本與葉爾欽共進行了兩次非正式的“無領帶會議”，在會議中葉爾欽表達願盡快結束領土爭議並希望在 2000 年時能簽訂日俄合約，橋本則提出所謂的“橋本—葉爾欽計畫”，用以提升日俄經貿關係。1998 年日本更成為率先邀請俄羅斯參加 APEC 高峰會的國家，並提供 15 億美元的無限期貨貸款給俄羅斯。除此之外，在第二次的“無領帶會議”橋本還提出關於北方四島的折衷方案，主要包含：

- 一、日俄雙方將以 Etorofu 島及 Uruppu 島的中間海域為國界，但是俄羅斯還是可以繼續在北方四島行使行政管轄權。
- 二、北方四島的確切歸還時間交由下一個世代的領袖去處理，在這期間日俄的經貿關係要繼續深化。橋本的這項提議是日本在北方領土上做過最大的讓步。

可惜在第二次的“無領帶會議”之後，葉爾欽及橋本相繼因為健康因素及政治因素辭職下台，日俄關係的發展陷入停滯。

2000 年普丁當選成為俄羅斯總統，於 2001 年與森喜朗在伊爾庫斯克達成“伊爾庫斯克公報”，雙方同意將根據 1956 年的《日蘇聯合宣言》及 1993 年的《東京宣言》進行領土爭議的談判，並以此為基礎簽定和平條約。

2013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俄羅斯，與普丁談到關於西伯利亞地區資源開發的合作及北方四島的可能解決辦法，會後雙方表示會加強能源開發德合作，可是關於北方四島卻還是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案，綜觀普丁從 2000 年至今的日俄關係並沒有甚麼太大的進展，主要還是因為雙方都沒有改變自 1956 年以來的預設立場，即俄羅斯希望先經濟後政治，而日本卻強調先政治後經濟的談判順序。

第十二節 日中關係—東亞地區的競合

1990 年代初期，雖然中國剛經歷過「天安門事件」後的動盪，但是改革開放後所帶來的經濟成效卻非常顯著，從 80 到 90 年代中國的年均 GDP 成長率都在 10% 左右，90 年代的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需要與東亞周邊國家維持相對和緩的關係，以利其維持經濟的高速成長，所以此時的中國對外政策可以說相當友善。日本在面對中國經濟的成功時，也尋求建立一種有自信但和諧的對中關係。對日本來說，和中國維持友好關係有助於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此外，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日本需要支付大筆的波灣戰爭費用及日本與俄羅斯的關係不穩定也促使日本採取較和緩的對中政策。

從 1992 年到 2002 年日中之間的貿易額大幅提升，從 1992 年的 300 億美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100 億美元，此外在這十年間日本還提供中國 9700 億日圓的援助貸款。冷戰後至 21 世紀初日本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也已經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

日本從 1970 年代日中建交以來即開始提供大量的援助給中國，自 1979 年到 2010 年止，日本共提供了 36462 億日圓的 ODA 給中國，日中建交至今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國。自 2005 起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日本減少了對中國基礎建設的援助，改以對人才培育、技術、環保等領域進行援助。

雖然日本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密不可分，但是日中之間還是存在著許多難以化解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將會繼續影響著日中關係的發展，雙方的摩擦主要在以下領域：

- 一、對歷史的見解不同

1995 年中國開始舉行全國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從此日中間對於二次大戰的歷史見解成為了阻礙兩國關係友好的一大心理障礙。

二、釣魚台的主權爭議

美國在 1972 年將釣魚台連同沖繩的行政管轄權一併交給日本，自此釣魚台就一直處於日本的管轄之下，並埋下了日後中國、台灣與日本對於釣魚台主權的爭議，並對中日兩國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1970 年代由於中日之間正處於友好的階段，故釣魚台問題還未對日中關係造成影響，但是到了 1990 年代，中日之間的船艦時常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發生碰撞以及登島的中方人員遭日方逮捕的衝突亦時常發生。釣魚台的爭議在 2012 年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將釣魚台國有化後越演越烈，自購島事件起中日之間的貿易額持續下滑，日資也出現開始撤離中國的跡象。

三、東海能源資源的爭奪

日本與中國在東海有專屬經濟區(EEZ)畫界上的爭議，直接影響到對東海海域油氣田的開採權。日本主張兩國的(EEZ)應以海域中間線劃分，而中國主張東海海床是大陸架的自然延伸，故日中的(EEZ)分界應以沖繩海槽為準。中國在 2005 年宣布位於海域中間線中國一側的「春曉油田」即將試開採，日本表示強烈反對，呼籲日中共同開採東海資源。中國於 2008 年提出日本可按照中國法律的規定與中方合作開採「春曉油田」，日本表示強烈不滿，認為中方提案不符合作開採的原則，東海油田的爭議至今仍未解決。